



无罪流放 知识分子20年沉重背负的改造史

丁玲在北大荒

郑笑枫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无罪流放 知识分子 20 年沉重背负的改造史

丁玲在北大荒

郑笑枫 /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丁玲在北大荒 / 郑笑枫著.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098-0092-8

I. 丁… II. 郑… III. 丁玲 (1904~1986) —生平事迹—
1957~1970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51601号

书 名: 丁玲在北大荒

作 者: 郑笑枫

责任编辑: 吴 江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58mm×230mm 1/16

字 数: 160千字

印 张: 17

印 数: 1-10000册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8-0092-8

定 价: 28.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82517249, 82517244

我的自传

□ 丁玲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我顽固地认为，一个写文章的人，只需要写文章。写各种各样的人、事、心灵、感情，写尘世的纠纷，人间的情意，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兴衰，写壮烈的、哀婉的、动人心弦的，使人哭，使人笑，使人奋起，令人叹息，安慰人或鼓舞人的文章。总之，什么样的文章都可以写，只是不要絮絮叨叨地在读者面前表白自己，这是很乏味的。因此我拒绝过许多人，留下了一些使人不快的影子。但这次徐州师范学院的教师们为了编辑《作家传略》而对我提出了殷切的要求，使我没有办法推辞，只得试一为之。这原不合我的本意，而时间又紧迫，写得不能如愿，请编者、读者共谅之。

我生于1904年，今年七十六岁。

我是湖南人，出生在临澧县，长在常德。我父亲的家庭属官僚地主。但我幼年丧父，四岁便跟着贫困的当小学教员、后来当校长的寡母辗转漂流。我本人成分是学生，我的家庭出身应该是自由职业者。

1930年在上海，我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左联的机关杂志《北斗》月刊，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和书记处书记。

我一生当过编辑，编辑过党报副刊、文艺杂志、基层单位的黑板报、墙报、油印的小报，领导过培养青年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也当过生产队的扫盲教员、夜校教员，辅导职工家属学文化、学政治；当饲养员、喂鸡、喂

猪、种地；还当过短时期的红军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当过八路军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1936年冬，担任苏区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主席；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和第五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理事。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妇女的代表，争取世界和平运动的代表，我参加过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和活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际友人。但我主要的工作是写文章，是一个写书匠，或者叫作家。

1927年我开始写作。先是写短篇小说，后来写中篇、长篇、剧本、散文、报道、杂文等。五十二年来，除最近二十多年写作上的空白外，共发表了二百六十多篇长短文章，约一百六十万字，但还没有写出一部理想的作品。作为一个专业写作者来看，量和质都是不够的。

在这五十二年间坐过两次监牢。第一次是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随即押到南方囚禁三年多。在这期间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在国民党刊物上写过文章，没有给敌人做过一点事。直到1936年秋，在党的帮助下逃出南方，奔向苏区。第二次是在1970年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代，关押五年多，得有时间通读了马恩全集和其他的经典著作，1975年无罪释放。

解放前出版过七八种集子，1933年全部被国民党查封，禁止出售。全国解放后出过五六本集子，1958年在反右扩大化中又遭到查禁，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纸型全部销毁。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久即将发行。预计今年出版的还有短篇小说选集、散文集、杂文集，30年代写的中篇小说《母亲》和《韦护》；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抗战前后写的短文《到前线去》和一本《丁玲近作》。

目前我正在从事一部搁笔中断了二十多年的长篇小说的写作。

1980年元月

序 □ 魏巍

《丁玲在北大荒》出版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想，延安时期与丁玲并肩战斗过的老文艺战士看到这本书，也一定会和我一样，感到高兴和欣慰的。

丁玲在北大荒的情况，一般人所知不详。过去，我怕触及她的伤痛，也没有多问过她，并且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她是被发配到北大荒的。后来我才得知，是她主动要求去的。笑枫同志撰写的这本书中又告诉我们：1963年，也就是丁玲在北大荒度过五年的艰苦生活之后，作协党组和中宣部的负责人曾想让她回来，并且说可以发调令，但她却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北大荒。丁玲到北大荒，无疑是她一生中的大事。我认为，她的这个决定很不一般，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没有非凡的勇气，是不可能采取这个行动的。而这个勇气则来源于她对党的信念和一贯的文艺思想；革命作家必须与群众相结合。丁玲当时认为，她住在北京的小四合院中，固然可以苟安一时，但被划了“右派”，没有人敢接近自己，这样就会形成与人民群众的隔离，而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对自己说：“不必犹豫了。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这就是她当时的想法。

自然，丁玲这次下去，和过去深入生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她到北大荒那年54岁，已经年老体弱了；第二，用丁玲的话说，这次是像林冲一样脸上“刺了字”的。丁玲说：“过去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个靠近中央靠近首长的上层人物，我下去时，一层一层的大小干部总要欢迎我。请我讲话，问我要什么材料，向我汇报。我的劳动也很简单，无非是做做样子，既不出一身汗，也没有满身病痛。那时人们对我鼓掌、含笑，围着我的汽车。看大作家下来生活。1957年下去就不一样了，头上有一顶很大的‘右派’帽子，因此，人们虽然同样围着看我，却像是看猴戏一样，只是觉得新鲜奇怪罢了。”只要意识到这种天壤之别，我们就会想到，她面临的这场考验是多么严峻，她面前的历程是多么艰辛！

然而，在这场长达20年的考验中，丁玲终于走过来了，而且是作为胜利者走过来的。尽管这个胜利不免伴着痛苦和眼泪。“我要在几乎没有任何光明的处境里开闢出一条光明的路来”，丁玲曾这样鼓励自己，她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以一个勇士的姿态做到了这一点。

这二十年，丁玲是怎样熬过来的，为什么能够熬过来呢？归根结底是她有信念。她始终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她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委屈的考验”。“谁一见我都说这是个大右派、大叛徒。但我在内心始终认为自己还是个共产党员，我要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她还说，“在那动乱的日子里，我是饱经磨难。好心人对我说：你死了吧，这日子怎么过？我回答：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我确信，丁玲正是依靠这坚强的信念才冲破一道道险关的。

我第一次看到丁玲同志，是1938年在延安。那时我在抗大学习，才18岁，正是人们说的“红小鬼”。因为喜欢诗歌，我经常到柯仲平同志那里去，就在那里见到过丁玲，但丁玲同志并不认识我。日本投降后，丁玲同志来到晋察冀，我也只在一位朋友那里遇到过她。直到解放以后，我才与她有些接触。她的作品，我以前断断续续地读过一些，但那时年轻，理解得很粗浅。

因此，虽然丁玲同志一向热情地鼓励我，但我却对她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加上年轻，脑子简单，这样，我也参加过作家协会批判她的集会，也做过错误的发言。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抱歉。但是，1957年把她打成“右派”，我在内心中是有怀疑的。因为1955年她已经作为“反党分子”被打倒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她根本没有参加，没有任何言论，这时的批判，只是把老问题又拿出来升了一下级而已。我记得，那时丁玲同志一开始就有不祥的预感，她曾在会上说，我怕把我打成“右派”。结果还真的把她打成了“右派”。以后这颗怀疑的种子在我心里越长越大，老是困扰着我，我曾私下多次问其他同志：“你认为丁玲是反党吗？她什么地方反党呢？”经二十多年，这桩冤案才算结束了，丁玲同志又站到我们面前来了。当我听到她所受的种种磨难，真是万分痛心，肝胆俱裂！但也正是在这样严酷、这样漫长的考验中，使我重新认识了丁玲同志。老实说，如果思想不很坚强，像这样严重的磨难、是会令人怨愤的，是会令人心灰意冷的，是会令人悲观失望甚至信心动摇的，然而，我们的丁玲同志，不单对党毫无怨恨之心，而是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念，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也更加热情奋发了。当她回到党的队伍时，她曾经在文章中热情地喊道：“党啊，母亲，我回来了！”我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也是“我感谢党！”我可以说，丁玲同志对党的耿耿忠心，她的共产党人的胸怀和风范，强烈地感动了我。从她的言论行动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丁玲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从三十年代以来的血泪与风雨中走过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从丁玲复出到她逝世的几年间，不论在国内或国外，她的全部言行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这正是丁玲的伟大之处。他决不会像某些人，把永远难以平复的怨恨带入作品中，讽刺，挖苦，谩骂，不仅使自己失去正确的立场，而且影响读者准确地、全面地理解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现实。

丁玲作为共产党员作家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她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笑枫同志经过实地调查，生动地再现出丁玲在北大荒的生活情景，充分体现了她的高尚品质。丁玲同志毕竟是老干部、老党员，她既有深入群众的

决心，也有接近群众的本事。她不管头上戴着什么帽子，一到北大荒就立即以党员的姿态出现。介绍信没有写要她参加劳动，她硬是要参加劳动；领导要她去条件好些的地方，她硬是要到条件最差的地方去披荆斩棘；她关心青年的健康成长，经常与不安心北大荒生活的青年促膝恳谈；她关心群众的疾苦，帮女工办起了托儿所；……在漫长的时日里，丁玲与北大荒人血肉般地连在一起了。丁玲复出时，正是当年丁玲亲自教他们认字的“文盲”们给她寄来了第一封祝贺的电报；丁玲逝世时身上盖的那面红旗，也是北大荒的群众敬献的。

丁玲逝世后，她的生平简介中说：“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我还想说，丁玲的党性，她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她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共产党员作家的典范！

人间的风雪呵，风雪的人间！正是在北大荒无边的风雪中，我望见了一个不朽的共产党员作家的崇高形象！

1987.6.4. 于北京

题记

我坐上北上的列车，去北大荒探访丁玲生前在这里生活、劳动的事迹。我沉思地紧靠在急速奔驰的列车车窗前，从车窗窗口向外望去，在一望无边的辽阔黑土大地上，我仿佛看到印着一条很深很深的脚印，这条脚印，从严寒的风雪荒原，一直通向北大荒人温暖的心间，在身处逆境的艰难坎坷岁月之中，这位曾是勇于呼唤新的觉醒与追求的中国文坛上左翼文学的战将，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坚贞信念和非凡的毅力，和北大荒人同欢乐，共艰苦，扎根风雪荒原12年，从人民中赢得了理解、信赖和敬仰。从桑干河到北大荒，从深深地印在北国边陲这片辽阔的黑土大地上的脚印，我仿佛听到一个革命作家坚贞不渝地走在人民中间的坚实的脚步声……

动身去北大荒前，我在陈明家待了整整两天。陈明心情沉重地回顾着往事时，我感受到：他的那颗失去亲人的心，仍在微微地抖动。从他的回忆中，我得知了丁玲去北大荒之前的一些情况。

目 录

我的自传 /1

序 /3

题记 /7

严寒的日子，已经降临 /1

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黑头目”的帽子，扣在丁玲的头上。1957年，她没讲一句话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丈夫陈明首当其冲，被发配到北大荒。羁留在北京多福巷的丁玲迫切想飞到寒冷的北大荒去，她说：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去……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我怎么能披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聒聒地叫，说着不是自己心里的话？

附：反右派斗争中的六日 /10

“向左村” /26

陈明向到来的丁玲描述：汽车在一米多深的雪中碾开一条道，就像在原始的冰山雪谷中行走。我们这些拿笔杆子的人，几天就在亘古荒原上亲手搭起了马架棚子。

王震将军向“右派”们训话：一个人右了，怕什么？还可以变左嘛！你们这个新居民点就取名叫“向左村”。

农场来了“大右派” /33

垦区领导和丁玲商量：是不是到一个条件好些的农场去？她回答：“我是来参加开发北大荒劳动的，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陈明被分配到二队种菜，丁玲在鸡排养鸡。

北大荒人说：老丁在我们这里，不仅是养鸡能手，而且是不是党员的党员。1961年，陈明摘了“帽子”，没有她；1962年摘帽又没有她，先进也不能评。老丁这样的人，为什么改造个没完呢？

“我愿意留在北大荒继续锻炼” /46

中宣部发调令，让丁玲回北京来。她给作协党组写信说：中央的精神，还是鼓励作家到基层去，我已经在下面了，我愿意继续留在北大荒锻炼。丁玲积极在农场帮助扫盲，办黑板报，在田头地边进行宣传鼓动，把延安的革命传统带到了北大荒。

纤笔一枝谁与似 /53

她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她对北大荒人说：你们生活在丰富的创作源泉之中，周围都是开发建设北大荒的英雄。这些英雄的业绩，应该写出来。

她在北大荒12年，写了一些歌颂北大荒人的文章，其中保留下来的是一篇替别人写的家史。

在宝泉岭农场 /61

农场的造反派怂恿中学生揪斗丁玲。那些向丁玲学写作的人，被作为“丁玲地下俱乐部”成员，受到批斗。但北大荒人在暗中保护她。农场家属揪着孩子们的耳朵说：你再跟着喊打倒丁玲，就撕破你的嘴。

在“牛棚”里，陈明偷偷传过来的纸条、火柴盒、芭米叶上短短的几句话，成了她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但

是一天深夜，她被脱光搜查，那些特殊书简都被销毁了。

1970年，丁玲和陈明被捕，离开了北大荒，押往秦城监狱。

附：三访汤原 /73

附：追叙夜审丁玲 /90

附：记入狱 /96

重返北大荒 /103

那些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北大荒人怎么样了？丁玲怀念他们。

“老丁回来了！”

丁玲和陈明走进场部附近的桦树林，那里有一片杂草丛生的坟包，长眠着当年和他俩一起垦荒的老朋友。他俩希望在桦树林里给他们留个地方，要永远留在北大荒。

归来华发苍颜 /120

美国记者问丁玲，何以在遭受折磨的漫长岁月里能活下来。她说：我深入人民之中，人民群众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是医治我心灵上隐痛的良药。

永不消逝的活力 /123

杨沫：我酷爱丁玲的作品，更敬佩她的人品。

杜鹏程：对生活的热爱永不磨灭，对人民的感情永不磨灭，对美的追求永不磨灭，这就是丁玲。

郑朝宗：中年以后，她遭了无妄之灾，脸上被刺了字，流放到边远山区，受尽奚落歧视。就是铁石铸造的人，到了此际也该意懒心灰、气息奄奄了，然而她不，她仍然奋起“飞蛾扑火”，决不示弱。

最后一篇作品 /141

很长一段时间内，丁玲因为在 30 年代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监禁这一段经历，遭到误解，蒙受诬蔑中伤。党性很强的丁玲，从不公开辩解。直到中央组织部作出为她彻底恢复名誉的决定后，她才说：现在我有责任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

飞蛾扑火 非死不止 /147

瞿秋白曾评论丁玲说：“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丁玲自己理解这个评论：我正是这样的，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

1986 年 3 月，一面北大荒人敬献的红旗覆盖在丁玲身上。

附：我怀念她 /153

附：风雪人间 /199

跋 /249

再版后记 /253

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黑头目”的帽子，扣在丁玲的头上。1957年，她没讲一句话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丈夫陈明首当其冲，被发配到北大荒。羁留在北京多福巷的丁玲迫切想飞到寒冷的北大荒去，她说：**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去……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我怎么能披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呱呱地叫，说着不是自己心里的话？**

严寒的日子，已经降临

全国解放后，丁玲本来决定留在东北从事写作，她感到解放战争已经胜利，要写的东西太多了。但革命工作需要她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来到北京，致力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1950年到1954年期间，她历任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和《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1955年一阵政治上的狂风暴雨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年底，她被无端地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

“这年年底，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陈明回忆说：“我接到通知，去听传达中央文件。会议开了三天，谈的都是丁玲的问题。文件列举丁玲的头一个大问题，就是曾经自首变节，这是指被特务秘密逮捕，关押在南京的那一段历史；第二个大问题，列举了全国解放她到北京工作后的四大罪状，我一听，全都不是事实。”

陈明感到迷茫：在前些时候的一些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这些会，丁玲参加了，她是知道的。她光明磊落，相信党会澄清事实，从未想到会被无端地给戴上这顶大帽子。她一点也不知道，完全被蒙在鼓里。

陈明感到迷茫：对人的处理，尤其要慎重，这是党历来的传统，也是党的组织原则。现在，他听了三天的传达、讨论、批判，有中央的红头文件，而且是结论性的文件，大会之后，就要向全国传达，这是一个关系到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一个共产党员命运的大事，而她本人竟一无所知。组织上既未找她谈过话，更设有让她在“结论”上签字，她的“帽子”就这样被戴上了；她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1955年冬，在北京多福巷16号幽静的小院里，丁玲安静地伏在书桌上，聚精会神地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她看到陈明听传达回来，很不在意地问：“会开完了？”

陈明强作欢笑，若无其事地说：“还没有完，要传达、讨论三天。”

开会，听传达，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两人在两个不同部门工作，谁开什么会，谁也不问谁，这已成为习惯了。吃晚饭时，丁玲还兴致勃勃地谈起《在严寒的日子里》的人物构思……

陈明的心头一酸，可又不敢向她说明：严寒的日子，已经落在了她的生命之中。

最后一天的会实际就是一场对丁玲的大批判会。会前先指定发言人按照定下的调子“批判”。发言批判丁玲的人，也感到茫然。天津作协接到通知，派几个人去北京参加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要确定在大会上的发言人，当时大家都很紧张，你推我推，有人就推孙犁。孙犁想：这太意外了，什么都不明白。他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辞谢。当时中

宣部一位负责人在场，帮了孙犁一把，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孙犁压在心上的一头石头落地了。这位负责同志为他排忧解难的这句话，他一直铭刻难忘。

会后，陈明回到家里，丁玲书房的台灯亮着，她连陈明推门走进屋来，似乎都没有觉察，还在埋头写她的《在严寒的日子》。此刻，陈明的眼眶湿润了，他再也不忍心瞒着她，但他还是不敢如实地把这三大批判丁、陈的会议情况和盘托出地告诉她。她在生命的历程中，所受的折磨太多了，他怕她承受不了这意外的打击，而且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无情的打击。

他轻轻地走到她的书桌前。丁玲抬起了头，向他微微一笑。陈明顿时感到：经受过那么多折磨的她还是那么单纯，那么天真。此时此刻，他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不能让她那颗纯真的童心，再蒙在鼓里了。

“老丁！”

丁玲“嗯”了一声。

“你的小说，暂时，是不是停一下，不要写了？”

“为什么？”

陈明婉转地说：“我听说中央有一个什么文件，谈到了、陈反党集团的问题。”

丁玲爽朗地回答说：“我已经向党作了详细的说明，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嘛！”

陈明劝她：“你是不是给中宣部党委会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这么个文件？如果真有，请他们送来给你看看。”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给丁玲送来了文件。丁玲据实向党中央提出申诉，中央接受了丁玲的申诉，批示由中宣部对丁玲的问题进行复查。张际春